

1978年12月,我被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当时湘潭大学教授、老诗人彭燕郊找到出版局领导,建议出版一套外国诗歌中译本丛书。那时候我因肺气肿,在疗养院住院。1982年10月我出院之后,出版社把编丛书的任务交给我。这就是《诗苑译林》。这

套书先后由湖南人民、湖南文艺两家出版社出版,时间长达10年(1983—1992年),共出书51种。1991年,这套丛书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

1992年,我离休。

转自《法治周末》2013年1月31日

我的结构与建筑设计道路

○钱本德(1959土建)

1954年考入清华时,正逢院系调整。清华成为单一的工科大学。我父亲钱树鼎一心希望我继承他从事的专业——建筑设计。而那年清华建筑系受苏联影响,决定建成为我国建筑艺术的象牙之塔,因此学制特别长。本来就十分热门的建筑设计专业,更成为众多清华学子竞相争取的香饽饽。但是要求进入建筑系,必须通过一道美术水平的测试。当然,为了保证学生具有一定的艺术天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那时,父亲正好从上海的华东建筑公司(今天的华东建筑设计院前身)调到新成立的一机部第一设计院。他是南京中央大学1931年1月建筑系毕业(该系自1930年至1935年,共毕业36人。都是当时我国建筑界的骨干),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室主任工作。我家住在甘家口。一个星期天,我去看望他,他郑重地取出一封信交到我手里,要我回到学校后亲自送交清华建筑系的戴志昂教授,并告诉我戴叔叔是他大学里的好朋友。我看也没有看便把信塞进了口袋。

回学校后,我掏出信一看,发现原来是父亲要求戴教授帮助把我分配到建筑系的求助信。我立刻傻了眼,没有想到一贯本分正派的父亲竟会为了我走起了后门。那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认为,不就是一次美术水平的测试吗,自己从小喜欢美术,画图是我的强项,更是爱好,这有什么为难的?因此决定不听从父亲的教导,把这封信丢到了一边,没有去找戴教授。

不久,美术水平测试便在学校图书馆进行了。参加的人真多啊!宽敞巨大的阅览室充满了迫切希望分配到建筑学班级的学生。测试的题目是素描一个相同的石膏花瓶。这个题目可以说是非常容易,但要画得出类拔萃、能够脱颖而出又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真不知道评分的教授们是如何根据此一张素描就能够衡量学生的艺术才干的。我反正是和大多数人一样名落孙山,被分配到了人数最多的“工民建”专业。

又一个星期天回家,父亲看见我劈头盖脸就问:

“你把我交给你的信送哪里去了?你

□ 回忆录

看见戴志昂教授没有。”

“我没有去找他。”我轻声回答。

“为什么？为什么？”他生气地逼问我。“你怎么这样不听话！这是决定你一生命运的大事情呀！”

看我不回答，他又说：“你看见三楼张阿姨家儿子没有，他和你今年一起考上清华。看他多听妈妈的话，只找了戴教授一次，便轻轻松松地进了建筑系。”

“我知道”，我回答说：“可是我从没有想过走后门。我不想做这样不光彩的事。”

“不光彩！朋友之间帮这点忙，有什么不光彩的？”

我告诉他，我打听过了，原来戴教授就是戴季陶的儿子，戴季陶是我一贯尊敬的孙文主义的倡导者。一辈子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秉公执法，光明磊落，最后以身殉职。我怎么好意思请他的儿子违背他父亲一贯的意愿，帮我私人的这个忙，何况我还是个共青团员。

父亲沉默了一会，叹口气说：“好儿子，你这样做人我并不反对。可是你知道，搞建筑设计就是搞艺术，特别是从今年起，清华建筑系要学习苏联成为建筑艺术殿堂。我实在没有想到，我这个老建筑师的儿子，反而阴错阳差地没有去读建筑系。而我听苏联专家讲，工民建专业培养的主要对象是施工员。你看见你姑夫肖永龄没有，他就是个施工员。在我们这36个人里边，就数他的工作最艰苦。害得你姑妈钱树芳跟着他到处跑工地、住工棚、吃大锅饭、蹲茅屎坑；冬天冷、夏天热，而且工作业绩还不被人重视。你看那些有名的建筑，人家只知道设计师的大名，特别

是建筑师的大名，谁知道施工员是谁？”

父亲讲的是实情，我真很为当施工员的叔叔们打抱不平。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工民建专业，毕业后却分配到了位于济南的山东建筑学院，从事高校的教学工作。虽然主要承担施工类课程，经常带着学生跑工地，爬脚手架，和许多施工员结成了好朋友，但自己却从来没有体会过当施工员一职的滋味。做的工作总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教室到教室。由于当时领导的器重，经常当班主任，特别是当该校唯一的建筑设计本科班班主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红得发紫。北京多次举办新技术展览，建设部在广西召开全国预应力会议，我都是学校唯一代表。我曾被两次动员入党，第一次在济南，却因为不能忘情于反右中班长邢镇宣自杀的悲剧，借口自幼跟随母亲信基督教，并受过洗礼婉拒了。第二次在带领学生“长征”延安途中，说实在的，这次我是真的从内心感激党的宗教政策的伟大，但我不是一个轻易食言的人，而且受当时的派性混乱局面干扰，我的“宗教信仰”终于未能因此而改变。

不久，领导又主动宽宏大量地把我调回南京，使我的家庭在十多年分离后终于得到团圆，则更使得我内心无比感激涕零，决心向祖国建设献出自己的浑身解数。因为当时工民建专业早已经与结构设计合并，而我的单位——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则主要设计与玻璃有关的工厂，因此我的主要工作是从事工业厂房的结构设计工作。除了完成分配的任务之外，我在业余时间内发表了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这可说是我的论文多产的黄金

时期的开始。

可是我的努力结果出乎预料地没有得到本单位的欢迎。后来才知道，少数结构设计负责人，一直在撺掇领导要我改行搞建筑设计。这主要是我的一篇结构设计论文《变形和缝宽为约束条件与“经济含钢率”》发表到了当时全国权威的《建筑结构》杂志上了。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单位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且该文是为了纠正该权威杂志难得出现的一项错误，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认为这将使得他们的业务统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为了让我安心搞建筑设计，他们承诺将一个工业设计院难得接到的南京上新河文化馆的设计任务交给我。当然，这对于原来就希望能够得到公共建筑设计锻炼的我是个不小的诱惑。可是，紧接着院里又接到了设计雨花台区电影院的任务，他们立即把这项任务也一起交给了我。这下我真的有些慌了，毕竟自己知道连一天象牙之塔也没有进过，如何胜任这样两项严肃的公共建筑设计任务呢？可是领导的命令推辞不得，此时，手忙脚乱中的我，忽然发现这两个电影院设计中都需要将观众厅地面坡度设计正确，而此事由于牵涉到不同的视点、规模、遮挡标准等多方面要求，其地面坡度与剖面设计比较难以掌握，成为一般设计者的拦路虎。于是我别出心裁地编算了一本《观众厅地面坡度简易计算表》。由于当时正好“文革”后期，群众文化贫乏的时期刚结束，电视又没有来得及普及，正经历一个电影院、剧院的盲目发展期。我的这项不需要使用者多费脑筋研究计算原理，只需要按我规定的一定规律查找出表中数字，进行简单运算即可设计出答案的工

具，立刻被作为一项科研成果受到领导高度重视。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我自己是计算后用硫酸纸一字一字刻印的，领导则委托誊印社大量抄写、散发。结果有一天有人找上门了，说经过计算，我的数字发现差错。幸亏我有自己硫酸纸上白底蓝字的对照留底，证明错误全部在誊印社的粗心抄写。这个观众厅地面坡度计算表也由于准确、可靠而出了名，被许多设计单位普遍采用。我庆幸自己的成果没有白费。

电影院的设计工作最后因为建设单位经费不足流产了。可是我的建筑设计工作却是铁板钉钉，从此成为我的主要工作。这当然也是我所盼望的。当年我父亲希望我继任他的职业搞建筑设计，结果我却因为一篇结构专业论文被同事排挤而圆了他老人家的梦，可谓歪打正着，想想也觉得好笑。从此，我不但干了半辈子的建筑设计工作，使我成了一名“一级注册建筑师”，一名“成绩优异高级工程师”（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1999年12月），而且因为在心血来潮时，我喜欢在《建筑学报》、《城市开发》、《住宅科技》等杂志发表一些自己的设计心得和不同见解，这些心得见解常常蕴涵重要的思想火花。例如在我国掀起建设住宅小区高潮时，我发现建筑日照问题十分关键，因为它既关系到改善人居环境这一重要课题，也直接影响到如何充分利用寸土寸金的城市建设用地。因此我创造了一个衡量住宅小区日照环境客观效果的重要指标。我后来称它为“科学日照指标”。我将自己的这个想法写成论文，翻译成英文后投寄到国际著名的《建筑与环境》杂志。没有想到，竟获得了该刊主编威尔逊教授的首肯

□ 回忆录

与巨大支持，被全文刊载在该刊1995年第3期上。此事极大地鼓舞了我进一步研究的积极性，我满怀希望地用中文写了一个简介，连同原文一起亲自送交给母校建筑系的刊物《世界建筑》编辑部。主编李宛华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衷心祝贺我的这一成功，她要我回去等候编辑部的消息。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等来的她的来信竟然是：因为我的论文他们没有人看得懂，因此决定不予刊登。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吃惊心情，他们不懂完全可以理解，这说明自己没有表达清楚。一般来讲，编辑部应该提出问题来质疑我，现在信中没有提出任何问题，这很可能是出于礼貌的原因，因为自己写得实在太差了，人家无从问起。但我自问既然威尔逊教授也没有这

样说，自己的文章至少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即使经过讨论，我的文章被驳得体无完肤，我也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谁能够肯定自己的立论一定是正确的呢！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今天能够在课堂里平静地接受高等教育，可知道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就如本人当年，欢天喜地地走进教室的时候，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后来会遭遇这么多的折腾与磨难。本人自问才能比较平庸，因此在清华学习时，一贯为人低调，从不敢抛头露面。走上工作岗位后，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就是业余时间多了一份研究和探索的好奇心。想不到，在我们的周围，有这么多的新鲜事物，值得我们去探讨、去学习。

往事如烟

○程法伋（1946外文）

程法伋，1920年10月出生，福建闽侯人。1942年9月进入西南联大学习，后在校内发起并组织了进步团体“剧艺社”。1945年昆明“一二·一”爱国运动中，他是西南联大学生会领袖之一，并以昆明学生代表身份面对面地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与斗争。1947年至1949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2月进入美国新闻处工作。194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解放后在上海外事处任科长。1954年调往外交部工作，历任外交部西欧司科长、处长、专员等职。“文革”浩劫中饱受迫害，1978年8月平反并重

返外交部综合研究室工作。1983年2月离休。2012年4月1日，程法伋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本文是程法伋在2001年为怀念去世一年的妻子张燕俦所写。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燕俦撒手人寰，转眼已满周年。

6月间，听说松声不慎摔了一跤，我去他家探望。松声不胜感慨地说，现在我们俩都一样的了，意即我们都是丧偶的孤寡老头儿了。燕俦和校岚走得很突然，燕俦死于脑梗，校岚死于心梗，她们都是遽